



杨和平 著

浙江音乐史

Zhejiang Yinyueshi

 **SMPH**
上海音乐出版社
WWW.SMPH.CN



杨和平 著

浙江音乐史

Zhejiang Yinyueshi

上海音乐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浙江音乐史 / 杨和平著 - 上海: 上海音乐出版社, 2014.10

ISBN 978-7-5523-0521-0

I. 浙… II. 杨… III. 音乐史 - 浙江省 IV. J6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86150 号

书 名: 浙江音乐史

著 者: 杨和平

出 品 人: 费维耀

责任编辑: 崔 晶

封面设计: 陆震伟

印务总监: 李霄云

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市福建中路 193 号 200001

上海音乐出版社 上海市绍兴路 7 号 200020

网址: www.ewen.cc

www.smph.cn

发行: 上海音乐出版社

印订: 上海市印刷十厂有限公司

开本: 787×1092 1/18 印张: $21\frac{2}{3}$ 图、文: 390 面

2014 年 10 月第 1 版 201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1,500 册

ISBN 978-7-5523-0521-0/J · 0456

定价: 68.00 元

读者服务热线: (021) 64375066 印装质量热线: (021) 64310542

反盗版热线: (021) 64734302 (021) 64375066-241

郑重声明: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浙江省文化研究工程指导委员会

主 任：夏宝龙

副主任：王辉忠 黄坤明 葛慧君 赵一德

刘 奇 郑继伟 金德水

成 员：孙景森 舒国增 胡庆国 李云林 胡 坚

刘希平 钱巨炎 吴顺江 焦旭祥 金兴盛

陈昆忠 郑新浦 张伟斌 郑仓元 童 健

陈德喜 蒋承勇 梅新林 许 江 陈一新

钱建民 鲁 俊 马 以 徐加爱 陈 新

吴蔚荣 王永康

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成果文库总序



有人将文化比作一条来自老祖宗而又流向未来的河,这是说文化的传统,通过纵向传承和横向传递,生生不息地影响和引领着人们的生存与发展;有人说文化是人类的思想、智慧、信仰、情感和生活的载体、方式和方法,这是将文化作为人们代代相传的生活方式的整体。我们说,文化为群体生活提供规范、方式与环境,文化通过传承为社会进步发挥基础作用,文化会促进或制约经济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文化的力量,已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

在人类文化演化的进程中,各种文化都在其内部生成众多的元素、层次与类型,由此决定了文化的多样性与复杂性。

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来源于其内部生成的多姿多彩;中国文化的历久弥新,取决于其变迁过程中各种元素、层次、类型在内容和结构上通过碰撞、解构、融合而产生的革故鼎新的强大动力。

中国土地广袤、疆域辽阔,不同区域间因自然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等诸多方面的差异,建构了不同的区域文化。区域文化如同百川归海,共同汇聚成中国文化的大传统,这种大传统如同春风化雨,渗透于各种区域文化之中。在这个过程中,区域文化如同清溪山泉潺潺不息,在中国文化的共同价值取向,以自己的独特个性支撑着、引领着本地经济社会的发展。

从区域文化入手,对一地文化的历史与现状展开全面、系统、扎实、有序的研究,一方面可以藉此梳理和弘扬当地的历史传统和文化资源,繁荣和丰富当代的先进文化建设活动,规划和指导未来的文化发展蓝图,增强文化软实力,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思想保证、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舆论力量;另一方面,这也是深入了解中国文化、研究中国文化、发展中国文化、创新中国文化的重要途径之一。如今,区域文化研究日益受到各地重视,成为我国文化研究走向深入的一个重要标志。我们今天实施浙江文化研究工程,其目的和意义也在于此。

千百年来,浙江人民积淀和传承了一个底蕴深厚的文化传统。这种文化

传统的独特性,正在于它令人惊叹的富于创造力的智慧和力量。

浙江文化中富于创造力的基因,早早地出现在其历史的源头。在浙江新石器时代最为著名的跨湖桥、河姆渡、马家浜和良渚的考古文化中,浙江先民们都以不同凡响的作为,在中华民族的文明之源留下了创造和进步的印记。

浙江人民在与时俱进的历史轨迹上一路走来,秉承富于创造力的文化传统,这深深地融汇在一代代浙江人民的血液中,体现在浙江人民的行为上,也在浙江历史上众多杰出人物身上得到充分展示。从大禹的因势利导、敬业治水,到勾践的卧薪尝胆、励精图治;从钱氏的保境安民、纳土归宋,到胡则的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从岳飞、于谦的精忠报国、清白一生,到方孝孺、张苍水的刚正不阿、以身殉国;从沈括的博学多识、精研深究,到竺可桢的科学救国、求是一生;无论是陈亮、叶适的经世致用,还是黄宗羲的工商皆本;无论是王充、王阳明的批判、自觉,还是龚自珍、蔡元培的开明、开放,等等,都展示了浙江深厚的文化底蕴,凝聚了浙江人民求真务实的创造精神。

代代相传的文化创造的作为和精神,从观念、态度、行为方式和价值取向上,孕育、形成和发展了渊源有自的浙江地域文化传统和与时俱进的浙江文化精神,她滋养着浙江的生命力、催生着浙江的凝聚力、激发着浙江的创造力、培植着浙江的竞争力,激励着浙江人民永不自满、永不停息,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不断地超越自我、创业奋进。

悠久深厚、意韵丰富的浙江文化传统,是历史赐予我们的宝贵财富,也是我们开拓未来的丰富资源和不竭动力。党的十六大以来推进浙江新发展的实践,使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与国家实施改革开放大政方针相伴随的浙江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深层原因,就在于浙江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文化传统与当今时代精神的有机结合,就在于发展先进生产力与发展先进文化的有机结合。今后一个时期浙江能否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继续走在前列,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对文化力量的深刻认识、对发展先进文化的高度自觉和对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工作力度。我们应该看到,文化的力量最终可以转化为物质的力量,文化的软实力最终可以转化为经济的硬实力。文化要素是综合竞争力的核心要素,文化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资源,文化素质是领导者和劳动者的首要素质。因此,研究浙江文化的历史与现状,增强文化软实力,为浙江的现代化建设服务,是浙江人民的共同事业,也是浙江各级党委、政府的重要使命和责任。

2005年7月召开的中共浙江省委十一届八次全会,作出《关于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决定》,提出要从增强先进文化凝聚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增强社会公共服务能力入手,大力实施文明素质工程、文化精品工程、文化研究工程、

文化保护工程、文化产业促进工程、文化阵地工程、文化传播工程、文化人才工程等“八项工程”，实施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四个强省”。作为文化建设“八项工程”之一的文化研究工程，其任务就是系统研究浙江文化的历史成就和当代发展，深入挖掘浙江文化底蕴、研究浙江现象、总结浙江经验、指导浙江未来的发展。

浙江文化研究工程将重点研究“今、古、人、文”四个方面，即围绕浙江当代发展问题研究、浙江历史文化专题研究、浙江名人研究、浙江历史文献整理四大板块，开展系统研究，出版系列丛书。在研究内容上，深入挖掘浙江文化底蕴，系统梳理和分析浙江历史文化的内部结构、变化规律和地域特色，坚持和发展浙江精神；研究浙江文化与其他地域文化的异同，厘清浙江文化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和相互影响的关系；围绕浙江生动的当代实践，深入解读浙江现象，总结浙江经验，指导浙江发展。在研究力量上，通过课题组织、出版资助、重点研究基地建设、加强省内外大院名校合作、整合各地各部门力量等途径，形成上下联动、学界互动的整体合力。在成果运用上，注重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充分发挥其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的重要作用。

我们希望通过实施浙江文化研究工程，努力用浙江历史教育浙江人民、用浙江文化熏陶浙江人民、用浙江精神鼓舞浙江人民、用浙江经验引领浙江人民，进一步激发浙江人民的无穷智慧和伟大创造能力，推动浙江实现又快又好发展。

今天，我们踏着来自历史的河流，受着一方百姓的期许，理应负起使命，至诚奉献，让我们的文化绵延不绝，让我们的创造生生不息。

2006年5月30日于杭州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追本溯源——远古至先秦音乐（远古—公元前221）	5
概 述	5
第一节 远古音乐的断想	5
一、音乐神话与传说	5
二、关于音乐起源	7
三、音乐产生因子	8
第二节 河姆渡原始音乐	16
一、乐器踪迹寻觅	17
二、原始音乐形式	19
第三节 先秦越族音乐	20
一、越族音乐生活	21
二、越族民歌遗存	24
三、精美的青铜乐器	30
第二章 多元并存——秦汉至东晋南朝音乐（公元前221—公元589）	34
概 述	34
第一节 秦汉时期的音乐	36
一、歌舞百戏争妍	36
二、王充与《论衡》	41
第二节 东晋南朝的音乐	43
一、吴歌与清商乐	44
二、多姿的歌舞	50
三、八音之乐器	53
四、文人音乐	56
第三章 歌舞兼容——隋唐至吴越国音乐（公元581—960）	60
概 述	60
第一节 隋唐时期的音乐	61

一、民歌与曲子并存·····	61
二、宫廷音乐的辉煌·····	64
三、歌舞伎乐的兼容·····	65
四、说唱与戏曲的孕育·····	67
五、佛教音乐之变文·····	68
六、乐器与器乐发展·····	69
七、白居易的音乐情怀·····	74
第二节 五代时期的音乐·····	79
一、俗乐中的民歌·····	80
二、宫廷中的乐舞·····	84
三、砖雕上的优戏·····	85
第四章 词调曲韵——宋元时期音乐（公元960—1368） ·····	90
概述·····	90
第一节 两宋时期的音乐·····	94
一、市井音乐新景象·····	94
二、临安宫廷中的音乐·····	106
三、词调音乐的繁盛·····	110
四、乐器与器乐的演进·····	128
五、浙派琴人与发展·····	136
六、南戏的早期形态·····	141
七、两宋时期音乐理论·····	144
第二节 元时期的音乐·····	148
一、元杂剧的南传轨迹·····	148
二、南戏在发展中成熟·····	156
三、元时期的音乐理论·····	161
第五章 南腔北调——明清时期音乐（公元1368—1840） ·····	165
概述·····	165
第一节 多样的民间音乐·····	167
一、民间音乐生活·····	167
二、民间歌舞样式·····	170
第二节 丰富的民歌与小曲·····	173
一、民间的歌曲·····	173

二、民间的小曲·····	179
第三节 民间器乐的多维构建·····	181
一、器乐合奏形式·····	181
二、代表性琴家与传谱·····	183
三、代表性琵琶家与传谱·····	188
第四节 多彩多姿的民间戏曲·····	191
一、杂剧与传奇的脉络·····	192
二、浙江地方戏种概览·····	205
三、代表性戏曲理论家·····	213
第五节 特色鲜明的民间说唱·····	227
一、浙江地方说唱素描·····	227
二、陈端生与《再生缘》·····	231
第六章 新旧转型——近现代浙江音乐（公元1840—1949）·····	234
概 述·····	234
第一节 传统音乐的流变·····	236
一、地方戏曲的演进·····	236
二、地方说唱的发展·····	251
三、器乐合奏与社团·····	256
四、民间歌种与歌舞·····	268
第二节 学校音乐教育变迁·····	276
一、西方音乐的传入·····	276
二、启蒙的音乐教育·····	277
三、学校的音乐教育·····	277
四、专业的音乐教育·····	278
五、代表性的音乐家·····	281
第三节 音乐创作·····	356
一、声乐创作·····	356
二、器乐创作·····	366
第四节 音乐理论与交流·····	367
一、音乐理论成果·····	367
二、音乐文化交流·····	369
参考文献·····	372
后 记·····	378

绪 论

区域,现代汉语又称地域。历史学视野中的区域社会,一般来说,是从地理学、文化学和行政学等诸多层面,综合考虑若干相关要素,即以地理环境、民族、文化、语言、行政区划等方面为依据,来划分和界定区域社会的。按照我们的理解,区域社会就是建立在一定的地理条件基础上的、具有其独特文化和风土民情特征的、相对独立的地域性社会体系。因此,每个区域社会都具有自成系统的、区别于其他区域的文化、语言、风俗、经济和政治的结构,以及建立在上述结构基础之上的区域的共同传统。

“浙江”这个地名的内涵,同样具有地理学、行政学和区域社会学等诸多层面的意义。从地理学的维度来说,浙江既是水系之名,又是地方政区之名。作为水系名之浙江,即钱塘江,其地域范围涵盖整个钱塘江及其上游的新安江流域;作为政区名之浙江,唐代开始设置浙江东道、浙江西道。浙江东道领有越、衢、婺、温、台、明、处七州,浙江西道辖境相当于今江苏长江以南、茅山以东及浙江新安江以北地区。浙江成为一个省级行政区,始于元明之际,即公元1366年,朱元璋攻占杭州,设置浙江等处行中书省,简称浙江行省。从此,浙江作为一个省级政区,其辖境大致相沿至今。现代的浙江,是中国的一个省、一个地方行政区,浙江省是现今中国三十四个省、市、自治区、特别行政区中的一个省级行政区,其地理空间涵盖了钱塘江流域及其周边的甬江、椒江和姚江、甬江等流域。从区域社会学的维度,作为中国的一个省,浙江是中国的一个区域社会,一个在地理环境、社会经济、文化和风土人情方面均极有特色的区域社会,浙江音乐史也就是中国一个特定区域的音乐历史。

浙江作为一个省级地方行政区,历史短暂,不过六百三十多年。但是,浙江大地作为中国的一个区域社会或中华文明的一个地方区系,早在浙江建省以前就已经存在,并在数千年间发展出了独具地域特征的社会、经济和文化。追寻浙江历史的源流,最早可延伸至距今约十万年左右的旧石器时代的“建德人”,他们在今浙江建德一带,开辟草莱,揭开浙江历史的序幕。为了生存、繁衍,他们不得不与荒芜、恶劣的自然环境作斗争,从中体现出的灼灼智慧、开创精神、团结力量以及勤劳勇敢的品质因子,是浙江文化传统的滥觞。同时,有

关他们的神话与传说也正是各种艺术活动的发芽与开端,浙江音乐的文化因子从这里开始传播。

历史的车轮不断向前辗过,到了新石器时代,浙江境内先后出现浦江“上山文化”、嵊州“小黄山文化”、萧山“跨湖桥文化”、余姚“河姆渡文化”、余杭“良渚文化”等。21世纪初,北京大学文博院对上山遗址夹炭陶标本进行年代测定,表明该遗址的年代距今约一万年,是中国长江下游及东南沿海地区迄今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将浙江文明史在河姆渡文化七千年历史的基础上又向前推进了三千年。遗址共出土石器及陶器千余件,在夹炭陶片的表面,发现较多的稻壳印痕和大量的稻壳、稻叶、稻米遗存,是长江下游地区迄今最早的稻作遗存。上山遗址下层以大口盆、平底盆、双耳罐为典型代表的陶器群,不同于长江下游地区以往发现的其他新石器时代遗址,代表了一种新发现的、更为原始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类型。2005年,在浙江省嵊州市小黄山发现了相同类型的文化遗存,进一步证明上山下层文化类型不是孤立的。两处遗址位于浙江西南部山区和浙东地区过渡的丘陵、河谷地带,同属于一种新颖的地域文化。浙江萧山跨湖桥文化距今八千年左右,跨湖桥遗址考古发掘了以釜、钵、圆足盘、罐为代表的陶器群,它所在的萧山湘湖地区与余姚河姆渡文化只有百里之遥,但两处文化偏偏没有传承关系,其中出土的陶器,甚至比晚了一千年的河姆渡更为先进。河姆渡遗址则出土有大量石、骨、木、陶质的生产工具,有成堆的谷粒、稻秆和稻叶等水稻遗存,还有骨哨、陶埙等乐器。考古人员还发现河姆渡人当时居住的是“干栏式”房屋建筑,采用了较复杂的卯榫结构。可以想见,聪敏的河姆渡人早在七千年前就在浙江这片土地上过上了自给自足、自娱自乐的惬意生活。随着考古不断发现,稍晚于河姆渡时代,在今嘉兴马家浜、吴兴钱三漾、余杭良渚等地,也有原始人类生活的遗址遗物。这些遗址约计二百多处,遍及了舟山群岛、浙西山区、温瑞平原、杭嘉湖平原等浙江东西南北各地。有些遗址遗物,如良渚遗址出土的各类玉器,其工艺水平已有相当高的程度,充分证明了远古时期的浙江已是遍布聚落、人文活跃的地区。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人们有规律的生产与作息,物质上的迫切需要有所缓解,而长期的劳作实践以及相对的空闲生活使得他们萌发了最初的精神享受需要,表现在外的就是对视觉效果(如各种石器、玉器),以及听觉效果(如各种声音)的艺术化加工,前者造就了工艺美术,后者开创了音乐艺术。

从以渔猎为生的“建德人”开始,到以稻作农业为主的新石器时代,历经五万六千年左右,其间虽遭受多次海侵等严重自然灾害,但浙江文明的曙光仍生生不息,照亮并延续了千世万代。最先沐浴这份曙光的是继良渚文化之后一千年左右的于越人,有文字记载的浙江历史也始于此,如产生于秦汉时期的

两部著作——《越绝书》^①和《吴越春秋》^②就记载了于越民族的历史文化。《史记·夏本纪》载：“或言禹会诸侯江南，记功而崩，因葬焉，命曰会稽。”如今绍兴会稽山麓的大禹陵，传说是大禹的陵墓。《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载到，夏后帝少康令其庶子无余守护大禹的陵寝，既而成为于越部落的首领。关于于越民族的来源，还有学者认为“主要是本地区的土著居民，‘于越’族名的意义是于越人的图腾符号和他们所特有的稻作文化生产工具的融合，是于越稻作文化的一个具有标志性的文化特质。”^③春秋时期，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励精图治战胜了吴国，于越人足迹北踏山东琅琊；战国时浙江属楚；秦汉以来设郡县，浙江成为国家的一个区域，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汉至两晋，隶扬州。“浙江”这一行政区域名称最早出现在唐朝，唐设道，乾元（公元758—760）初分江南东道为浙江东道和浙江西道。五代时，钱镠建吴越国，以杭州为都城；宋室南迁后，设临安（今杭州）为京都所在地，浙江分属两浙西路和两浙东路；元设江浙行中书省；明初设浙江行中书省，浙江作为省名自此开始，后改浙江承宣布政使司；清为行省；民国十六年（1927）实行省县二级制，设杭州市；1949年5月浙江解放，现行政区域分为杭州、嘉兴、湖州、金华、衢州、丽水、温州、绍兴、宁波、舟山、台州等十一个市（地区），全省以汉族人口居多，少数民族人口主要为畲族，也有少数回、满、苗等族。浙江以特殊的地理位置、人文环境、历史沿革、民俗语言、经济方式等，促成了其特有的文化特色。

浙江文化传统的形成历来是多元互补、兼收并蓄的结果，历史上各个时期均有体现。先秦时期的于越国虽然在地域上与中原地区相距较远，但她与邻国吴、楚两国却交往甚密，其中不乏民族间文化的交流。越与吴不仅互为近邻，还同属百越族群，有共同的地理环境、气候条件，两地人的生活习性也都基本相似。但由于吴国地理上更接近中原，受周朝先进文化影响早而广泛，因此，春秋早期，吴的国力略胜于越。越几经沦为吴之附属国。待勾践即位，汲取富国经验，唯才是举，并能一面不耻为敌国君奴，俯首称臣，一面卧薪尝胆、发愤图强，最终打败吴国，迁都琅琊。吴越统一更加促进了文化融合。越与楚国文化相互影响也较深：越国的青铜冶炼、陶瓷工艺、农具建筑以及音乐歌舞等方面对楚国有影响；楚国的治国策略以及民俗等方面也对越国产生了重要影响，如助勾践大败夫差的重臣范蠡、文种都是楚国人。他们为越王献计献策，授的都是楚国治国之道等。秦汉时期，中央几次将北民南迁于浙地，北方的文化也

① [东汉]袁康、吴平辑录，越绝书[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② [东汉]赵晔原著，张觉校注，吴越春秋校注[M]，长沙：岳麓书社，2006。

③ 滕复等编著，浙江文化史[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40—43。

随之而来,与古越族文化相遇、交融,共同推进了浙江文化的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变迁跌宕。北方战乱不断,南方相对稳定,局势所迫,大量北方人主动南迁,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大规模文化南移,给浙江带来的不仅有丰富的劳动力,还有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知识,使得浙江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一跃而上,打破了长期以来政治、文化、经济重心在北方的格局。隋唐五代时期,国家统一、社会相对安定,南方与北方相比,政治环境更为稳定,尤其是五代时期的吴越国钱镠励精图志,对内施行保境安民的政策,社会安定,国库充裕,对外和平礼遇,免于五代时各国割据战乱。另有隋唐大运河的成功开凿,为南北经济、文化交流提供了便利的交通。这时期浙江在农业、手工业、商业等方面都有起飞势态。两宋时期,浙江已是国家首富之地,有先进的农业、发达的手工业、兴盛的商业,成为两宋国用主要供给地之一。南宋时,随着国都南迁临安(今杭州),政治中心也南移浙江,浙江无疑成为“文物之邦”。这时期,无论在经济、文化、科技、教育、艺术、学术等各方面,浙江都处于全国的领先地位。

从音乐史学角度看,对在某个区域中长期以来由于其共有的、特殊的民族属性、风俗习惯、语言特征、文化背景、经济条件、生存方式等,所形成的音乐文化现象、音乐审美趣味、音乐品种,以及与音乐艺术相关的传播、传承、音乐家、音乐作品、音乐思想等的挖掘与探讨,都有着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历史意义。一部浙江音乐史,就要对浙江音乐历史形成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音乐现象、乐器与器乐、宫廷与民间、乐律学和音乐文献、音乐作品与表演方式、场合范围、音乐家群体、个体音乐实践、音乐思想生成、发展与变迁作溯源探流;还应对音乐家相互之间的联系、音乐传播、传承过程中的相互借鉴、吸收、影响和补充进行挖掘开垦、钩沉耙梳;更需要从卷帙浩繁的音乐文献史料、音乐考古发现中搜集并整理出一个浙江音乐史的发展脉络。然而,区域社会和区域史意义上的浙江,其时空跨度均大大超越了政区意义上的浙江。浙江以特殊的地理位置、人文环境、民俗语言、经济方式等,促成了其特有的“轻细、婉转”的音乐文化特色,立足于我国传统音乐文化之林,有着广泛的影响。这部《浙江音乐史》就着眼于把浙江作为中国大历史的一个地域区系,把浙江音乐文化视为中华文明的一个区域性的亚文化系统,从区域文化的角度切入和立论,而不仅仅是编写一部省的音乐史。

第一章 追本溯源——远古至先秦音乐

(远古—公元前 221)

概 述

音乐文化同一切文化一样,不仅是人类物质创造和精神创造的共同成果,还是一种世代承传、不断完善的价值体系。当我们谈论音乐文化时,总不可避免涉及传统音乐文化,即历史上的民族音乐。其原因就在于传统音乐文化蕴涵着其所赖以生存的民族的价值观念和审美准则。

浙江音乐有着悠久的历史。虽然到目前为止,尚无材料证明距今五万年前旧石器时代的浙江建德人是否有音乐生活,使用何种乐器等等,但是基于狩猎和采集这一人类最早的生产方式考虑,原始人群体狩猎等活动中必然牵涉着某种声音的成分——这些声音成分很可能就是音乐的最初萌芽形态。20 世纪中后期以及 21 世纪初的考古发现:浦江“上山文化”、嵊州“小黄山文化”、萧山“跨湖桥文化”、余姚“河姆渡文化”、余杭“良渚文化”等文化遗址的出土,呈现了浙江新石器时代稻作文化的辉煌历史。其中,距今约七千年左右的河姆渡文化有了浙江音乐的物质考证——河姆渡遗址出土的骨笛、骨哨、陶埙等。并且这些器物已不单单只是先民狩猎等日常生活的工具,从它们所能发的音来考证,已经初具“乐器”的性能,即可以吹奏简单的乐音,拥有一定的审美内涵。浙江地区在秦统一之前仍是一块东夷之地,先秦时期,这里生活着“割发纹身”的于越人。于越人虽然没有中原的一套礼乐,但也形成了自己的本土音乐形态,为浙江特色音乐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第一节 远古音乐的断想

一、音乐神话与传说

神话,通常是一种神化了的故事说法,表现了“古代人民对自然现象和社

会生活的一种天真的解释和美丽的向往”。^①传说,如今理解为“辗转述说或群众口头上流传的关于某人某事的叙述或某种说法”,^②无论是神话还是传说,所陈述的事物、现象对于科学研究来讲,都是有待考察、论证的,不能作为一手资料来引证。然而,在民间文艺学中,神话传说却有着一席之地。因此,传说学还是民间文艺学科中的一门分支学科。“‘传说’一词,在我国古代,只有两个和它相近的词在文献上使用,一个叫做‘传闻’,一个叫做‘传讹’。司马迁写《史记》时,有许多材料是有历史依据的,但也有许多历史材料是没有史实根据的,其主要根据是‘传闻’。从《史记》以后,二十四史的编写,除了可信史料外,几乎没有一部是不依据前代或当代‘传闻’的。这便是我国历史典籍与民间传说‘剪不断,理还乱’的真实状况。这种状况,从有史以来已经历时三千年了。”^③几千年以来,民间百姓少谙文字,他们用自己的方式,或口耳相承、或行为表达等来记录着历史、述说着文化……无论是古希腊的神话故事,还是我国上古时代尧舜禹的传说,都有着与音乐有关的叙述,这些叙述也就成为我们了解远古音乐的发生及形态的媒介之一。

西方的历史文化源于古希腊,古希腊文化主要形成于公元前9世纪至前8世纪,繁荣于公元前5世纪至前4世纪。古希腊人敬重神灵,其许多艺术包括建筑、雕刻、美术等方面都与希腊神话相关,音乐也不例外。传说中的阿波罗、雅典娜、缪斯、狄俄尼索斯都是音乐的最初创造者和实践者,人们在祭神的活动中往往伴随着音乐表演,音乐在社会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另外,古希腊神话中具有人性特征的动人音乐故事,不断激发着历史上不同时代音乐家的想象力。传说古希腊竖琴之神奥菲欧在这个世界上只爱两样东西,他的妻子和他的竖琴。每天太阳升起和落下的时候他都会为美丽的尤丽荻茜唱一首歌。但好景不长,一天尤丽荻茜被森林里的毒蛇咬死了,悲伤的奥菲欧不能忍受没有爱妻的日子,他发誓要把妻子从死神那里抢回来。奥菲欧在忘川河边找到了妻子,他忧伤的歌声感动了地狱的怨鬼,同意他把妻子领回,唯一的条件是在他把尤丽荻茜领回人世之前不能回头看她。在那条通往人间的路上,奥菲欧急急地走着,后面跟着他心爱的妻子。那是一条怎样迷雾重重、幽深和寂寞的道路,没有生灵会从这里走回,寂静得让人心脏颤抖。走着、走着,奥菲欧疑惑起来:尤丽荻茜还在他身后吗?为什么没有声息?尤丽荻茜也疑惑起来:丈夫为什么看都不看他一眼?为什么只是这么急急地前行?她伤心地掉下眼泪,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 现代汉语词典 [Z].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2: 1123.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 现代汉语词典 [Z].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2: 194.

③ 乌丙安. 民俗文化新论 [M]. 沈阳: 辽宁大学出版社, 2001: 286.

他如果不再爱她,她宁愿回到死神那里。怀疑,怀疑是条毒蛇啃噬着奥菲欧那双抱竖琴的双手,他的脚步慢了下来,不由自主地回身用目光寻找着妻子。他的目光找到了她,在他的目光里,妻子美丽依旧,因为丈夫终于肯回头而露出了欣慰的笑容。但是那笑容永远地停留在了她的脸上,她就此倒地而死……西方第一部歌剧《奥菲欧》就是源于这一神话。

在我国,先秦典籍《吕氏春秋·古乐篇》载:“乐之所由来者远矣”远至何时,史无确载,古文献一般追溯到黄帝。传说黄帝得到一种长得像牛,名字叫夔的动物,使用它的皮蒙鼓,用雷兽的骨头作鼓槌,敲打起来,“声闻五百里”,黄帝用这面鼓扬威天下。夔和雷兽都是想象中的神奇动物。那时的鼓实际上和后世一样,多蒙牛皮,因此也成了神话材料。后来,夔转化成为主管音乐的“人”(神)。

有关夔的传说还有记载:

夔曰:‘戛击鸣球、搏拊、琴、瑟、以咏。’祖考来格,虞宾在位,群后德让。下管鼗鼓,合止祝敌,笙簧以间。鸟兽跄跄;箫韶九成,凤皇来仪。夔曰:‘於!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尚书·益稷》)

又有另一则关于制乐的传说:

帝尧立,乃命质为乐。质乃效山林谿谷之音为歌,乃以麋鞀置缶而鼓之,乃拊石击石,以象上帝玉磬之音,以鼓舞百兽。(《吕氏春秋·古乐篇》)

再如《吕氏春秋·古乐篇》中一则这样的传说:

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阙:一曰载民,二曰玄鸟,三曰遂草木,四曰奋五谷,五曰敬天常,六曰建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总禽兽之极。

这八阙似乎是歌咏祖先的由来。这首古乐总的说来是反映生产劳动和原始宗教信仰,它有歌有舞,“投足”是一种舞姿,手里拿着牛尾,象征着耕作的动作,由此可见原始时代的文学艺术活动经常和生产劳动有着密切联系,歌舞和音乐也总是互相结合的。由于原始乐舞即和原始巫术、祭祀等活动结合无间的缘故,人们对乐舞乃至一些乐器所抱有的神秘思想可能产生得很早。国家产生以后,统治者便会利用和加强音乐神秘观,以便操纵、控制乐舞,用来加强其统治。保存下来的一些音乐神话故事便是这样的社会背景的产物。传说分章节的大型乐舞《九歌》是夏代国君启从天上得来的。

二、关于音乐起源

讨论浙江远古音乐,需要涉及一个音乐的起源问题。关于音乐的起源这一问题,古今中外有不少学者进行了大量的探求,然而观点各异,莫衷一是。